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55

出土文獻

研究方法論文集 初集

葉國良

鄭吉雄◎編

徐富昌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55

出土文獻

研究方法論文集 初集

葉國良

鄭吉雄◎編

徐富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 初集／葉國良, 鄭吉雄
，徐富昌編. ---初版---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2005〔民 94〕

445 面；15 * 21 公分.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55）

含索引

ISBN 986-00-2414-6（平裝）

1. 簡牘 - 論文, 講詞等

796.807

94019226

統一編號 1009403063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55

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

編 者：葉國良、鄭吉雄、徐富昌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李嗣涔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地 址：臺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 話：02-23659286

傳 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2005 年 9 月初版

ISBN 986-00-2414-6

定價：新臺幣 550 元

導 言

鄭吉雄*

2002 年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成立，我開始著手規畫東亞文獻研究室的工作，而提出了「出土文獻研究方法研究計畫」。我的構想，東亞文獻研究既要加強傳統文獻學諸如版本、目錄學的研究以及文獻的蒐訪、輯佚，同時也應以廣義的語文學（philology）為基礎，將語言學、古文字學等涉及語源學（etymology）的知識領域，和經典解釋、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等研究領域相整合。邁入二十一世紀，隨著新材料的出現、新觀念的提出，以及新方法的運用，「整合」早已是人文學研究的一條坦途。每位學術工作者的時間與精力都有限；而隨著資訊工具的精進，每個領域的知識又不斷累積愈來愈龐大的研究成果。透過整合，既可以讓不同的研究理念與方法相激盪，也可以更有效地分享研究資源，引導出新的研究課題，讓研究工作更上層樓。另方面，傳統文獻研究的主要成果對其他相關的學科（諸如思想史、語言學等），實有重要的助益；而其他相關學科的視界與觀點，對文獻研究也會有意想不到的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東亞文獻研究室召集人。

啓發之功。思想文化的研究需要堅實的文獻研究支持，而文獻研究也在許多方面需要和思想文化之研究整合。這一新趨勢，尤其可以在出土文獻研究的工作上得到證明。

出土文獻研究原本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工作。它一方面需要豐富的傳世文獻知識支援——研究者必須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之間進行交叉的分析考證；而另一方面，由於出土文獻涉及上古史和思想史等範疇，其中的問題又絕非文獻學者能全盤處理。唯有古器物學家、古文字學家、上古音專家、文獻學家、經學家、哲學家通力合作，才能有突破性的成果。近一世紀以來，中國的出土文獻，計其對學術界影響最大的，約有四類，分別為甲骨文及金文文獻、簡帛文獻、石刻文獻和敦煌文獻。敦煌文獻自光緒二十六年（1900）千佛洞住持王圓籙道士發現敦煌石室以後，敦煌學早已成為二十世紀的顯學之一，所涉及問題之廣，非本書所能涵括。其餘甲金文獻、簡帛文獻和石刻文獻的發現，對於中國上古史的重構、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傳世經典內容的考釋、古代社會文化的演進，都有關鍵性和突破性的助益。七十年代出土的長沙馬王堆帛書、以至於九十年代分別在湖北、湖南、山東、長沙、安徽等地出土的竹簡文獻（尤其郭店一號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更掀起了東西方學術界研究的潮流。各國學者紛紛進行隸定文字、考釋年代，以及探索思想屬性等工作。短短三十年之間，海峽兩岸、日本、北美、歐洲等各地學術界針對「簡帛學」舉辦了不計其數的學術研討會、發表為數極多的論文和專著，也成立了許多研究組織。然而，由於原始出土文獻大量湧現，學者多

傾力於釋讀文本，對於研究方法的反思，勢必相對忽略。這種情況，尤以初入行的研究者為然。就個人所見，有的學者看到某一種新出土文獻的本子，就輕率地持以修改傳世文本的內容；也有的學者未深究上古韻部的關係，就遽爾用通假之法而誤判異文。這一類的情形在簡帛學的領域並不罕見。依此情形發展，十餘年間即有大師鉅子興起，亦勢必須為修正錯誤推論而殫精竭慮，遑論開創新猷？個人不揣淺陋，頗欲邀集學術界同仁共同探討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的問題，一以呼籲專家學者用力於此，一以為新進研究者提示軌轍。這是我在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構思並提出「出土文獻研究方法研究計畫」的初衷。

這部論文集，是該計畫的階段性成果。猶憶 2002 年秋天我在中文系第五研究室向葉國良教授提出了上述的想法，並面邀他為計畫共同主持人，獲得他慨諾支持，不久我們邀請了徐富昌教授加入，計畫的推動工作益形穩健。個人認為，方法與方法論的檢討，是今天出土文獻研究工作的當務之急。學術用語所謂「方法」(method)，一般指的是學者運用特定工具以駕馭材料、達致結論的方式，是屬於技術層次的；而方法論(methodology)則是指運用某一種方法的背景，是屬於理論層次的。前者是「如何」(how)的問題，主要是要問怎麼去分析文獻；而後者則是「為何」(why)的問題，主要是研究者自身的反思——反躬自問各種方法的定位、效用與限制。針對這兩方面的問題，我在中心先後舉辦了三次主題學術研討會，以及

兩次中心學術講論會，¹邀請了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美國和日本的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最後選了十四篇論文，輯成本書。全書分爲「方法與方法論」、「郭店楚簡」、「上博簡」、「石刻」、「考古學」、「竹書紀年」等六個單元。

關於方法與方法論的討論，收錄了葉國良〈二重證據法的省思〉、〈失姓碑誌考證方法及其相關問題〉二文，和季旭昇〈〈孔子詩論〉分章編聯方法淺探〉和林啓屏〈疑古與信古之間——以古代中國思想的研究爲例〉等共四篇論文。葉國良是著名金石學家，在〈二重〉一文中透過自身專業的知識，對二重證據法的立說本源以及方法運用作出分析，並以自身的實務經驗，說明具體操作方法，等於對王國維得自「宋人成法」的理論，作出新詮。〈失姓〉一文則參酌前賢的經驗（如明代王行〈墓銘舉例〉），專論考證失姓碑誌的主人姓氏的方法。作者以一貫紮實的治學風格，列舉實例，提出「求全拓以得其實」、「考內容以得其姓」、「辨誤讀以得其正」三種方法，並進而分析第二項方法的困境。葉教授作爲計畫共同主持人和本書的主編之一，在本書的第一個單元中提示了重要的方向。上述三種方法，施用於碑誌考釋，固然允當；但金石學源遠流長，方法成熟，相關理論用於簡帛研究，亦深具參考價值。季旭昇〈〈孔子詩論〉分章編聯方法淺探〉討論了學術界極爲分歧的《上博

¹ 分別爲「出土文獻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2003年10月22日）、「上博簡與出土文獻研究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年4月10日）、「東亞語文學與經典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年11月19、20日）。兩次中心學術講論會則分別是「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第23次學術講論會」（2004年10月6日）和「第29次學術講論會」（2005年3月29日）。

簡》〈孔子詩論〉分章編聯的問題。歷來學術界對該篇作品提出過十種以上的分章編聯方式。作者從區分「外圍研究」與「內緣研究」兩個方面開始切入，檢討了馬承源、濮茅左、李零、李學勤、楊澤生等學者的意見，從合理性、符號形態、竹簡痕跡等多方面作出判斷，提出了他重新分章編聯的看法。林啓屏的論文對於近代疑古思潮作了若干「解構」的工作，並進而說明了「疑」與「信」兩種態度對於古代思想研究的影響。他特別舉《中庸》的年代問題為例，說明客觀的「文獻證據」可用以驗證主觀的「理論判準」。我不認為林教授是要全盤否定「理論判準」。無可否認，「理論判準」涉及相當複雜的問題，從一方面說，建立在淵博學識與豐富經驗上的「理論判準」往往有驚人的有效性，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潛藏研究者特殊的學術信仰，而無可避免地著染主觀的思想色彩。

「郭店楚簡」的單元收錄了徐富昌〈典籍異文之鑒別與運用——以簡帛本與今本《老子》為例〉和福田哲之〈字體分析在出土文獻研究上的意義——以郭店楚簡〈語叢三〉為中心〉兩篇論文。徐富昌大膽而全面地從字形、讀音、訓詁，透過大量實例，以簡帛本與今本《老子》為對象，分析了異文、增文、省文、倒文、衍文、脫文等問題，並分析通假、異義、形訛、避諱等現象，說明典籍鑑別與運用的方法與限制。作者素治秦簡和古文字，利用其專業知識所獲得的結論，有相當參考價值。福田哲之的論文則論證字體之檢討是第一手資料之出土文獻研究的基礎。郭店楚簡〈語叢〉是一組特別讓研究者感到棘手的竹簡，主要是它的殘斷頗為嚴重，因此簡與簡之間的接續

問題便顯得特別重要，而字體分析也的確是重要的判準依據。

「上博簡」單元共收錄五篇論文，分別為張光裕〈上博楚竹書〈從政〉篇釋讀補說〉、竹田健二〈「容成氏」中有關身心障礙者之論述〉、淺野裕一〈黃帝書〈十六經〉的宇宙生成論〉、廖名春〈楚竹書〈內禮〉、〈曾子立孝〉首章的比對研究〉和徐少華〈竹書〈民之父母〉的文本比較及相關問題分析〉。張光裕是海內外著名的古器物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也是上博簡的發現者和整理者。他在釋讀〈從政〉篇並刊佈成果後，綜攬學術界反覆研討的成果，重新針對「𪛗」、「五德」、「飢滄」的釋讀作出補充，並以他上博館的實務經驗，提示楚簡材料整理方法。竹田健二的論文則注意到《上博簡》〈容成氏〉篇有許多關於身體障礙的記載，而回溯《孟子》和《禮記》，綜合地分析了春秋戰國戰亂不斷導致社會上出現大量殘障者、以及文獻所載儒家照顧身體障礙者的思想。竹田的論文兼具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理趣，而淺野裕一的論文則偏重於思想史的分析。作者主要區分先秦兩個思想文化系統：其一系統居於中原，以儒家思想為代表，而以上天、上帝為宇宙創生者的觀點肯定人類文明；另一系統則屬於荆楚，以道家思想為代表，而持物質性的宇宙生成論批判人類文明。黃帝書〈十六經〉則企圖揉合這兩種思想，標誌了戰國晚期黃老思想的特殊現象。廖名春的論文則注意到〈內禮〉篇和《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的同異，並透過文辭、文義的校勘，得出後者改寫自前者的結論，也分析了先秦儒家思想的若干信念。方法謹嚴，結論亦可靠。徐少華的論文將《上博簡》〈民之父母〉和《孔子家語·論禮》和《禮

記·孔子閒居》作文獻的比較，推論前者雖較為原始，卻與後二者均源出儒家子夏一派學說，是同一篇經典於不同時期的傳承。廖、徐二先生的論文都奠基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嚴密校勘基礎之上，為相關的研究作了很好的示範。

分屬「石刻」、「考古學」和「竹書紀年」的三篇論文——趙超〈古代石刻材料中的古文字釋讀與出土古文獻整理〉、馮時〈天地交泰觀的考古學研究〉和夏含夷〈《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討論方向不同，但恰好擴大了本書的討論範圍。在簡帛學蔚為風潮的今天，石刻材料似受到冷落。但正如我在前文所指出，金石學源遠流長，方法成熟，許多寶貴的經驗可提供相對年輕的簡帛學參考，而趙超的論文恰好提示了我們一點：古代石刻材料中的異體文字給予了我們釋讀古文字的重要啓發。利用古文字學的分析規律，以及石刻文字資料提供的知識去分析考證簡帛文字和其他先秦古文字材料，完全可行。馮時專治考古天文學，他運用大量傳世文獻、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獻中天文學的資料，交互證明，推論中國古代的交泰思想起源甚早，也加深了我們對《易經》泰卦思想的認識。夏含夷的論文對於《竹書紀年》提出了新奇可喜的推論。他不厭其詳地追溯這部汲冢文獻出土和流傳的歷史，提出《今本竹書紀年》反映了基本原樣的推論，但同時他也謹慎地指出這並不代表《今本》完全可靠。綜合而論，他認為重新考訂今本與古本《竹書紀年》絕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學術工作。

三年以來，我的構想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支持，謹藉

本文感謝各篇作者願意將他們堅實的研究成果貢獻給本書。此外，兩位共同主編葉國良教授和徐富昌教授除了為計畫撰寫論文以外，還參與全書主題的設計和體例的訂定。他們為本書的編輯付出心力外，並替各篇論文做了前置性的調整、造字、校對、排版的工作。沒有兩位的支持，這部書是無法編集成功的。至於各篇內容的校改和複核，以及全書定稿，則由我和研究室的助理們負責。倘仍有誤，那就是我的責任。

學術研究的終極意義，在於真理追尋。人文學者追尋的真理，雖然多屬抽象的形上理念；但也正因其為抽象，馳聘於精神世界的人文學者往往本著任重道遠的使命感，寧取其過程的嚴謹，而不考慮方法的難易。這種嚴謹的態度，讓一個世紀以來的出土文獻研究，在材料的檢查上和方法的討論上，愈來愈細膩；而材料與方法的反覆檢討，其實就是未來獲得堅實結論的重要保證。換言之，研究者從研究出土文獻，轉而為研究「研究出土文獻」的材料，再轉而為針對研究的方法作出反思。這樣的情況看似不斷向後退；但焉知這種後退，不是另一種「以退為進」？近一世紀以來探討出土文獻研究材料與方法的論文愈來愈多，似已證明了研究者對於這種「以退為進」，已有甚深的穎悟；而我們研究計畫的階段性結集，也恰好標識了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這部論文集題為「初集」，我衷心希望以後能有機緣，繼續以「二集」、「三集」的形式編纂下去。

2005 年 9 月 22 日識於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

目 次

導言	鄭吉雄 i
----------	-------

方法與方法論

壹、二重證據法的省思	葉國良 1
貳、失姓碑誌之考證方法及其相關問題	葉國良 19
參、〈孔子詩論〉分章編聯方法淺探	季旭昇 41
肆、疑古與信古之間 ——以古代中國思想的研究為例	林啓屏 69

郭店楚簡

伍、典籍異文之鑒別與運用

——以簡帛本與今本《老子》為例

.....徐富昌 99

陸、字體分析在出土文獻研究上的意義

——以郭店楚簡〈語叢三〉為中心

.....福田哲之 189

上博簡

柒、上博楚竹書〈從政〉篇釋讀補說.....張光裕 205

捌、〈容成氏〉中有關身心障礙者之論述

.....竹田健二 219

玖、黃帝書〈十六經〉的宇宙生成論...淺野裕一 233

拾、楚竹書〈內禮〉、〈曾子立孝〉

首章的對比研究.....廖名春 265

拾壹、竹書〈民之父母〉的文本比較

及相關問題分析.....徐少華 289

石刻

拾貳、古代石刻材料中的古文字釋讀

與出土古文獻整理.....趙 超 307

考古學

拾參、天地交泰觀的考古學研究.....馮 時 323

竹書紀年

拾肆、《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夏含夷 339

詞目索引.....443

二重證據法的省思

葉國良*

一、前言

民國十四年（1925），王國維先生（1877-1927）在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證」一課時，於講義中提出如下著名言論：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¹

王先生所提「二重證據法」，迄今不斷為學界所引據。實則上引文字之提法，²不無瑕疵，王先生稍後已有補充，而學者多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¹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1章，收入《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第6冊。又收入《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

² 民國二年（1913），王國維先生撰〈明堂寢廟通考〉中已有「二重證明法」的說法，見《雪堂叢刻》本，後收入《觀堂集林》時，刪去其中九段，「二

未措意，因而部分人士對此一研究文獻的方法不無認知模糊或誤解的情形。由於研究方法關涉研究時切入的角度以及推論時的內在邏輯，與研究成果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追溯王先生的原意，以釐清誤解或模糊的認知，似有必要。因不揣仄陋，試論之如下。

二、二重證據法的針對性

民國十二年（1923），北京大學顧頡剛先生在胡適先生主編《讀書雜誌》第九期發表回覆錢玄同先生的長信，信中對古史研究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其基本的意見是：早期歷史由於受到後人不斷的累增，因而晚期文獻的內容比起早期反而更加豐富，然而相對的也更加不可靠。顧先生的主張，錢先生在該刊第十期回信加以贊成。很快的，劉掞黎先生發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一文，質疑顧、錢二人的理據，於是引發持續的「古史辨」的大爭論。³

重證明法」云云亦在其中，此事遂鮮為人知，詳參洪國樑：《王國維之經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張以仁先生、程元敏先生指導，1987年）第1章第2節。按：王氏該文說：「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兩漢之書得其證明；而此種書，亦得援以自證焉。吾輩生於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證明法，不可謂非人生之幸也。」此言已具有「二重證據法」的畧形，但提法不夠鮮明，也缺乏具體操作的論述，因此討論王氏之說，引據「二重證據法」即可。

³ 以上詳參《古史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1冊，頁82-92。

民國十四年四月，王國維先生受聘於清華學校研究院，擔任經、史、小學等學科的導師，既講授有關課程，復指導學生研究，而自身之觀點與顧、錢等人不同，自須提出相應的理論，以為講學宗旨。「二重證據法」之說，即針對顧、錢等疑古派學者而發。

顧、王二先生的主張，最顯著的差別是：顧先生取早期的材料和晚期的材料作比較，從事歷時性的觀察。王先生則取同期（或時代最相近）的出土材料和紙上材料作比較，作共時性的互證。

我們分析二先生的主張，可以推知各自理論的內在邏輯。顧先生認為：經過早、晚期紙上材料的比對，累增現象極為明顯，國人相信晚期材料中記述的古史，其古史觀自屬可疑；因而也可以推論，早期的材料比起更早期的史實，也未必可靠。王先生則認為：以較早期的材料否定較晚期的材料並不恰當，因為每一個時代的知識不必然都記錄在紙上，這些紙上材料也不必然都能傳到後世，因此僅依據早、晚期紙上材料的比較而作出論斷，結論不必然能夠成立；既然學者擁有非經偽作的出土同期（或時代最相近）的材料，則可以和紙上材料相印證，證明這些紙上材料的可信程度。王先生的提法，基本上是在破除只以早、晚期紙上材料作比較的思維。

顧先生最著名的言論，乃懷疑黃帝至夏商二朝只是神話或傳說而非真正存在。譬如國人自來相信禹乃夏朝的開國君主，